

从经学到国学:近代大学传统学科变革的逻辑

张亚群

(厦门大学 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经学与国学是对传统学术的不同表述,与传统学科的变革密切相连。百余年来,从经学到国学的嬗变,不仅是传统学科地位的变迁,也是教育目的、学科建制、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式的转变,对教育和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代改革开放为国学教育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开放的中国需要国学教育。实施“双一流”建设,需要协调传统学术与现代学科、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关系。推动国学走进现代大学课堂,应选择大众化和专业化的教育路径,更好地发挥国学的育人功能。

关键词: 经学; 国学; 近代大学; 传统学科; 变革逻辑

中图分类号: G5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80460(2018)04007712

经学与国学是对传统学术的不同表述,与传统学科变革密切相连。学科作为知识分类和教学组织形式,是大学教育的基础,与知识生产、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密切相关。受文化传统影响,中国古代教育形成独特的知识体系和学科建制。无论是先秦的“孔门四科”,汉唐以降察举、科举的“分科”取士,还是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的知识分类,都与西方学科传统迥然有别。作为中国近代大学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意义上的“学科”是清末从西方移植而来的。“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转型中,学科变革处于核心地位。从传统的中学分类转向近代西方的学科分类,对于中国大学制度建设和专门人才培养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1]一部中国近代大学教育史,就是学科不断变革与扩展、学科建制演化的历史。从学科的视角,探讨中国近代大学传统学科变革的逻辑,可为当今大学学科建设和传统文化教育提供有益借鉴。

一、清末经学科的成因与教育困境

经学是传统文化的主干之一。它发端于子夏和荀子,既是阐释和研究儒家经典之学,也是经世致用的学问,在汉代以下古代文化体系中,经学担负维系学术传统、治国理政的功能。经学兴起之契机在于汉武帝兴太学、独尊儒术和察举取士。《汉书·儿宽传》载:儿宽“治《尚书》,事欧阳生。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贫无资用,尝为弟子都养。时行赁作,带经而锄,休息辄读诵,其精如此。以射策为掌故,功次补廷尉文学卒史”。儿宽因经学才能突出,被汉武帝召见,“语经学,上说之,从问《尚书》一篇。”^[2]读经应举是汉代士人入仕的重要路径,它开创了后世科举选士之先河。

在传统学术分类中,经学以其博大精深的文化意蕴和独特的社会政治功能而位居“四部”之首。作为中国学术的重要源头,经学包括“经”“传”“疏”三大部分,涵盖训诂、义理、词章、音韵等

收稿日期:2018042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16ZDA230)

作者简介:张亚群,男,安徽庐江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学博士。

学问。在二千多年的历史演变中,经学教育形态不断演化,儒家经典代代相传。汉武帝设“五经”博士专司教学,太学生研习专经。此外,各级官学讲授《孝经》《论语》,作为士人共同必修课和研习五经的前提,合为“七经”。《孝经》和《论语》的兼经地位,“直到北宋中叶后方被《四书》所取代”。^[3]唐宋时期,适应科举选士发展需要,经学教育出现“九经”“十二经”“十三经”,形成庞大的经传诠释系统。经学教育在古代中国和东亚产生广泛的文化与政治影响。

另一方面,由于经学与封建政治紧密相连,经学教育不可避免受专制思想束缚,存在自身的局限性与弊端。在清代,“经典教义为东亚儒生、官吏、学者提供了一套论述政治、社会善恶的学说。若要坚持圣贤的理想,就要尊崇、研究古代圣人的学说。经学赋予儒学以合法性。”^[4]晚清时期,在西方坚船利炮和科学文化的冲击下,经学教育遭遇空前危机,不得不向西式教育转型。1901年至1905年间,伴随急促的书院改制和科举革废举措,清政府全盘移植西方学科、学校制度,传统经学经过西式学科化改造,以经学科和经学课程的形式,被纳入新的学校教育体系。

经学教育的学科化,始于1904年1月颁行的《奏定学堂章程》,主导者为晚清重臣张之洞。《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分为八科。所谓“科”,既是某种知识的分类,也是一种学术组织机构,由此建立“科门”建制。设经学科并置于各科首位,为张之洞独创,旨在借助西方学科制度,保障“中学”独特地位。新学制以西学分类取代中学分类,大学教育从“四部之学”转变为“八科之学”。学术分科及知识系统这一重大变革,是清末文化转型和学制改革的结果,包含了“移植”西学和“转化”中学两条路径。经学科是从传统学术中演化而来的,属于“转化之学”,^[5]其创立动因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第一,从思想渊源看,经学科是晚清洋务派等倡导的“中体西用”思想演变合乎逻辑的产物。

“中体西用”论发端于早期改良派思想家。1861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西学富强之术。”其后郑观应进一步阐释“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知其缓急,审其变通,操纵刚柔,洞达政体。教学之效,其在兹乎。”^[6]这一理念作为特殊历史条件下为调和中西学矛盾而形成的一种近代化理论模式,为洋务派所认同,广泛运用于晚清社会政治、文化和教育变革中。

“戊戌变法”前夕,张之洞“规时势,综本末”,著《劝学篇》,系统阐释其“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教育思想。他认为“窃惟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此皆往代之明效,而吾先正不远之良轨也。”为了“保国、保教、保种”,须培养“新旧兼学”“政艺兼学”的人才。他提出“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讲西学必先由中学。“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缺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7]在这里,张之洞以中国传统学术分类,与“西学”“西政”并称,阐释“中体西用”思想。此后,《癸卯学制》经学科的设立,就是这一教育理念的制度化体现。

第二,从办学实践来看,经学科的设立,继承和发展了近代书院、洋务学堂的经学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是晚清经学教育经验的总结。

读经与学习西文西艺是洋务派办学的两大特色,张之洞素重经学和洋务教育。早在出任四川学政、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期间,他先后创办尊经书院、广东水陆师学堂、广雅书院、两湖书院、湖北自强学堂等教育机构,培养兼具经学、实学的专门人才。如广东水陆师学堂规定“堂中课程限定每日清晨先读《四书》《五经》数刻,以端其本。每逢洋教习歇课之日,即令讲习书史,试以策论,俾其通知中国史事兵事,以适于用。”^[8]广雅书院初设经学、史学、理学与经济四门,令诸生分门研习,并通习词章。这些办学实践,为其后教育改革积累了经验。

在《劝学篇·学制》中,张之洞提出“凡东西洋各国,立学之法,用人之法,小异而大同,吾将以为学式。”“学式”即学制。他认为“今欲存中学必自守约始,守约必自破除门面始。”^[9]从教学变

革来看,所谓“守约”就是要精简经学教育内容,保留其要旨;所谓“破除门面”则是打破经学原有体系,根据人才培养现实需要,重构新的经学课程。为此,他归纳出如下一些读经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方法:一是“经学通大义”。所谓“大义”,就是切于治身心治天下者。二是“史学考治乱典制”。史学切用之大端有二:一为事实,一为典制。三是“诸子知取舍”。以儒经尤其是《论语》《孟子》的经义作为权衡标准,节取、折衷诸子学说。宋明理学“看学案”。四是“词章读有实事者”。五是“政治书读近今者”。六是“地理考今日有用者”。七是“算学各随所习之事学之”。八是“小学但通大旨大例”。这就是“解六书之区分,通古今韵之隔阂,识古籀篆之源委,知以声类求义类之枢纽,晓部首五百四十字之义例。”^[10]在读书进程上,以十五岁为分界,此前诵读《孝经》《四书》《五经》正文,并读史略、天文、地理、歌括、图式诸书及汉唐宋文。自十五岁始,统读经、史、诸子、理学、政治、地理、小学各门,五至十年可通。此后专攻时政,广究西法。其有好古研精愿为专门之学者,博观深造,任自为之。

上述经学教育主张,集中反映了张之洞的传统学科变革思想,融入《癸卯学制》,形成各级学校经学课程。

第三,就政治动因而言,创设经学科是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不同势力妥协的结果,适应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现实需要。

晚清统治阶级内部存在满族与汉族、洋务派与顽固派等不同政治势力的矛盾冲突。1902年8月张百熙进呈《钦定学堂章程》提出“节取欧美日本诸邦之成法,以佐我中国二千余年旧制”,“必以真能复学校之旧为第一要图”。^[11]实际上,该学制主要移植日本学制,除了规定授予学堂毕业生附生、贡生、举人、进士科名,以及文学科设立“经学”“理学”“史学”“诸子学”等传统科目,此外并未保留多少“学校之旧”。由于清政府认为张百熙“喜用新进”,加之满汉竞争,该章程颁布不到一年即被废止。1903年7月张之洞受命会同张百熙、荣庆重新厘订、增补各项学堂章程。所订《学务纲要》规定“无论学生将来所执何业,在学堂时,经书必宜诵读讲解。”^[12]由此确立经学教育在新式学校的首要地位。

为了维护清朝封建统治,1906年3月学部奏议将“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作为教育宗旨。奏议认为“各国教育,必与其本国言语、文字、历史、风俗、宗教而尊重之保全之,故其学堂皆有礼敬国教之实。”为此要求“无论大小学堂,宜以经学为必修科目,作赞扬孔子之歌,以化未俗浇漓之习”;“其经义之贯彻中外,洞达天人,经注经说之足资羽翼者,必条分缕析,编为教科,颁之学堂,以为圭臬。”^[13]这一奏议得到清廷批准,为推广经学教育提供了保障。

第四,从学科设置来看,清末引入西方近代学科概念和课程模式,为经学科教学提供了范例。

与中国传统学术分类“以研究主体为分派标准”相异,近代西方学术门类是“以特定的研究对象为分科标准”。^[14]受其影响,张之洞改革经学教学,采用分科设目、分门授业的形式。经学科设11学门,包括周易、尚书、毛诗、春秋左传、春秋三传、礼、仪礼、礼记、论语、孟子、理学等;另于文学科内设中国史学、中外地理学、中国文学门类,传授“国粹”。各门课程分为“主课”(专业课、“补助课”(专业基础课)及“随意科目”(选修课)。在分科大学中,经学科专业课最少,除了理学门有5门主课,其他学门只有“专经研究法”1门主课。此外,设置较多专业基础课、选修课。经学科既有训诂、经典研究等传统学问,也有法学、教育学、历史学、地理学、科学史、逻辑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西方近代学问。在研究方法上,重视“通经致用”,要求“求经学之有用,贵乎通,不可墨守一家之说,尤不可专务考古。研究经学者务宜将经义推之于实用,此乃群经总义。”^[15]这些改革反映了经学教学与研究的新取向。

为了保存经学,张之洞还变通学制,创办专门学堂。《学务纲要》提出“古学之最可宝者,无过经书”,应效仿西方国家教育制度,“归专门者自行研究”。^[16]1907年张之洞在武昌经心书院兴办湖北存古学堂,招收举贡廪增附生,分为经学、史学、词章、博览诸门,兼习兵操,学制七年。他建议清

廷规定每省设一所存古学堂,或邻省合办一所。1911年4月,学部颁布《修订存古学堂章程》,统一规定立学总义、学额及入学条件、考试及毕业资格、收费与管理办法。

由上述可见,经学科的创立,是从传统经史子集之学向近代分科之学转化的重要环节,在传统学科变革中居于核心地位。其愿望是要以经学统领近代科学,维系儒学的统治地位,但在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在实施过程中陷入教育困境。

首先,经学的“学科化”导致经学体系瓦解,儒学教育丧失自身的系统性和独立性,成为依附新式学校教育的若干科目。中西学术分类和教育传统原本存在巨大差异。从西方学科分类标准来看,经学并非一门学科,而是政治、历史、语言文学等多学科的集合。清末教育改革以西学分类为标准,分解经学科目门类,转化为各级学校课程。在新的学术分科体系下,原有经学体系被分解为中国文学、伦理、历史、地理、政治等独立学科。除了经科大学开设专经课程,其他分科大学仅设“人伦道德”“经学大义”等通识课程以及说文学、音韵学等少数相关专业课程。采用班级制分科教学,形成学科化特征。

其次,课程体系以西学科目为主,经学科目锐减,教学程度降低,削弱了经学教育的作用。清末大中小学皆设经学课程,但科目不多,注重传授儒家伦理大义。《学务纲要》规定“经学课程简要,并不妨碍西学。”在此课程体系下,文言文要求下降,读经范围缩小,各级学生的学科基础及知识结构发生显著变化。高等学堂及优级师范学堂所设经学课程,采用断代专题概要的学习方式。人伦道德一科“专讲宋、元、明、国朝诸儒学案,及汉、唐诸儒解经论理之言,与理学家相合者,令其择要讲习”。^[17]经学大意一科讲《钦定诗义折中》《礼记义疏》等经典,属于经学知识普及性教学。

再次,经学教育的宗教化和专业化,淡化了经学课程的人文性质,不能传承儒学经典的文化精髓。《学务纲要》认为“外国学堂有宗教一门。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因此,办学把学堂读经作为保存“圣教”的手段,将孔子之道简化为“三纲五常”,^[18]作为清朝统治的根本。这种教育价值取向与时代发展趋势相背离。此外,兴办“存古学堂”,只是利用新式学堂的形式来“保存国粹”,而在培养目标及教学计划、要求上,则与高等学堂第一学科(经、法、文、商)及大学堂治专经者并无显著差异,加之财政困难,湖北、江苏存古学堂先后停办。在大学堂,虽设理学研究专科,作为专业课程讲授,但也存在明显“西化”弊端:一是以西方学科标准分割中国传统学术,失去原有学术整体性和生命力;二是过于崇尚专业分工,切断了儒学通识教育优良传统。王国维指出“分科大学章程中最宜改善者,经学文学二科是已”,其根本之误在缺哲学一科。他指出群经不可分科“夫我国自西汉博士既废以后,所谓经师,无不博综群经者。国朝诸老皆然。”“且大学者,虽为国家最高之专门学校,然所授者,亦不过专门中之普通学,与以毕业研究之预备而已。故今日所最亟者,在授世界最进步之学问之大略,使知研究之方法。至于研究专门中之专门,则又毕业之事业,而不能不俟诸卒业以后也。”^[19]这一见解超越了狭隘的专门教育的观念,揭示了大学本质特征。王国维建议将经学科并入文学科,以保持完整知识体系。这一主张虽未被清政府采纳,但对民国初年大学宗旨及分科改革产生重要影响。

废科举后,儒学教育的政治功能大为削弱,经学地位急剧下降。1906年、1907年皮锡瑞出版《经学历史》和《经学通论》,预示经学时代的终结。张之洞惊呼:近来学堂“种种怪风恶俗,令人不忍睹闻。至有议请废罢《四书》《五经》者,有中小学堂并无读经讲经功课者,甚至有师范学堂改订章程,声明不列读经专科者”;^[20]“于读经讲经功课钟点,擅自删减,以及剪发胶须诸弊层出,实为隐忧。”^[21]在此社会背景下,1909年京师大学堂筹办分科大学,志愿入经科者寥寥无几,学部只得选取举人优拔贡入读。这表明经学教育已面临严重危机。

二、国学教育的兴起及其学科属性

国学教育是经学教育衰亡后而兴起的传统文化教育形式。近代国学属于宽泛的概念,它与

经学密切相关,但价值取向有异,含义更广,涵盖经史子集各类传统学术。一般认为,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22]与“西学”相对而言。也有论者指出“近代国学并非传统学术的简单延续,而是中国学术在近代西学影响下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形态。”^[23]国学概念的产生及国学教育的兴起并非偶然,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

清末民初国学概念的流行,具有鲜明的政治与文化取向。1904年邓实发表《国学保存论》,强调国学不仅是“一国之学”,更是中国作为“汉族的民主的国家”之学术,体现了兴民权反专制和严“夷夏之防”的宗旨。^[24]如果说清未经学科的创立,主要与“忠君”“尊孔”相连,那么此后以国学研究院所、国学专修科为主要代表的国学教育的兴起,则打上了“民主”“科学”的时代烙印,两者在政治目的和价值取向上存在显著差异。另一方面,无论是经学教育抑或国学教育,它们在知识分类和学科设置上均取法西学标准。

从教学层面来看,国学教育发端于清末国学保存会以及赴日中国学人的国学讲习活动,以章太炎及其弟子的讲学为主要代表。1902年蔡元培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国教育会,其主要成员章太炎、黄宗仰讲授国文和“革命佛学”。1905年初,邓实、黄节等在上海成立国学保存会,每月开办讲习会,切磋国学。1906年章太炎赴日本主编《民报》,在神田大成中学成立国学讲习会,业余讲授文史学、制度学、宋明理学、内典学等科目,并成立国学振兴社。回国后,章太炎在北京、上海等地讲授国学,砥砺士人民族气节。1935年章太炎在苏州设立章氏国学讲习会,分班讲学,促进了国学教育的发展。

国学教育的另一种路径就是创设专门学校。1907年3月国学保存会拟设国粹学堂,学制三年,“以保存国粹,阐明实学,养成通才为宗旨”。学科设置“略仿各国文科大学及优级师范之例,分科讲授,惟以国学为主,另有学科预算表”。^[25]教学科目包括经学、武事学等22科。国粹学堂因经费缺乏未办成,但它设置的西学分类方法和教学科目,为后人提供了参考。民国时期一些学人举办国学专修学校,成为国学教育的重要机构。

国学教育的第三种路径就是将国学列为普通学校的教学和研究科目,这是二三十年代颇为流行的教育模式。如1920年北京大学设立研究所国学门(亦称国学研究所),1925年清华学校开办大学部及国学研究院,次年厦门大学创办国学研究院。此后,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等教会大学相继创办国学教育和研究机构。在中等学校,普遍开设“国学概论”课程。这一时期国学教育的兴起,主要有四方面原因。

其一,民国初年制定新的教育宗旨和大学设置标准,为国学教育确立了指导思想与学科基础。

以辛亥革命为转折,中国近代教育的培养目标和实施路径发生深刻变革。民国成立伊始,适应民主共和的政治要求,教育总长蔡元培废止中小学读经课程及学堂奖励科名制度,提出“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坚”,^[26]实施完全人格教育。制订《大学令》,确立“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大学为研究学术之蕴奥,设大学院”。^[27]这一方针和法令为国学教育指明了发展方向,确立了塑造健全人格、培养硕学通才的目标。

在学科设置上,废除经学科,大学改为七科。经学科原有科目《论语》《孟子》《诗》《尔雅》《尚书》《三礼》《大戴记》《春秋三传》等,分别并入哲学、文学、史学门。1913年1月公布的《大学规程》规定文科分为四门,与传统学科相关的学科包括:哲学门之中国哲学类,设有16种科目,首门科目为中国哲学,包含《周易》《毛诗》《仪礼》《礼记》《春秋·公·谷传》《周秦诸子》《宋理学》等9门课程;文学门之国文学类,设有13种科目,包含《说文解字及音韵学》《尔雅学》《词章学》3门传统科目;历史学门之中国史及东洋史学类,设有15种科目,其中2科为传统科目:中国史包含《尚书》《春秋左氏传》及秦汉以后各史;法制史包含《周礼》、各史志、通典、通考、通志等。上述科目分类奠定了国学教育的学科基础。

其二,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的理念,为国学教育提供了新的价值标准和研究方法。

1915年开始兴起的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极大地冲击了旧有文化观念和文化体系,启迪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学术界开始提出采用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分析和整理中国传统学术。胡适认为“国学”只是“国故学”的缩写,研究中国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他提出研究国学的三个方针:“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以传统教育制度为例,“懂得了欧美高等教育制度史,我们更能了解中国近一千年来的书院制度的性质与价值。”^[28]这些主张推动了国学研究和国学教育的开展。

与晚清经学教育实施者不同,这一时期的国学教育倡导者大多具有留学经历或在国内接受过新式教育,其中不乏学贯中西者,如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陈垣、林文庆、胡适、吴宓等人。他们主张采取西学分类和现代大学学科建制,研究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培育国学研究人才。北京大学仿德美两国大学之Seminar办法,成立国学研究所,作为各学系三年级以上学生及毕业生专攻一种专门知识之所,由章氏弟子、著名训诂学家沈兼士任主任。清华学校缘于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研究之需要,创立国学研究院。强调采用科学方法,对于自汉迄今之中国经籍和近世所出古代史料,做“会通细密之研究”;引进欧洲哲理文史诸学,做精深比较之考究,“以挹其菁华而定其取舍”。吴宓在开学演讲中指出:“惟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即时人所谓科学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29]同期创办的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以整理国故、养成国学专门人才为己任,强调国学研究的材料虽是中国的,但方法却是世界的,^[30]这就是普遍适用的科学研究方法。

其三,西式教育弊端引发学人对书院价值的反思,推动了国学教育的兴起。

清末以来,西方学科制度盛行,削弱了中国学术文化传统。论者指出“在西学的冲击之下,中体动摇,作为中学纲领的经学解体,取而代之以史学为中轴的国学又继而分崩离析,中学已是无本可据。”^[31]这种现状引起知识界对中国传统文化命运的忧思。胡适提出“如果对新文化的接受不是有组织的吸收的形式,而是采取突然替换的形式,因而引起旧文化的消亡,这确是是全人类的一个重大损失。”因此,应探寻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32]闻一多感慨“吾言及吾国古学,吾不禁怒焉而悲。”“而惟新学是鹜者,既已习于新务,目不识丁,则振兴国学,尤非若辈之责。惟吾清华以预备游美之校,似不遑注重国学者,乃能不忘其旧,刻自濯磨,故晨鸡始唱,踞阜高吟,其惟吾辈之责乎!”^[33]盲目、机械移植西方教育,孳生急功近利、不合国情的弊端,激起教育界的反思。

1920年4月,蔡元培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指出“学校确有不及书院之点。”昔日书院院长或擅长文学,或长于经学与小学,从其学者,能文者辈出,莫不感化。“因为院长以此为毕生事业,院内尚自由研究,故能自由发展。现在学校内科目繁多,无研究余地。”书院教育方法,“比现行年级制、划一制可以发展个性。”^[34]1928年舒新城指出“自五四而后,中国固有的教育精神几完全消灭,而西洋之新精神又未曾学得”,因此,“教育者以至于一般民众均感觉教育的改造为目前当务之急”,乃提倡书院制之讲学精神。^[35]

在教育实践方面,一些学人致力探索国学教育新模式。1920年冬,施省之、陆勤之等捐资,唐文治筹建无锡国学专修馆并任馆长,后改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该校汲取传统书院教育菁华,注重品格修养、学行合一,培育国学人才。谢无量等人执掌成都国学馆,传授国学。1928年全国教育会议上,甘肃省教育厅提出议案“大学院成立国学研究所,以整理国故”,“全国各大学均设国学专科”。^[36]这些建议和举措促进了国学教育和研究。

其四,国际教育机构的经费资助,为教会大学兴办国学教育提供了动力和保障。

近代西方基督教教会来华办学,在传播基督教义过程中,注重中国文化研究。1928年12月,美国霍尔基金会成立哈佛燕京学社,专门从事汉学研究,资助燕京大学等中国六所教会大学(后增

加华中大学) ,其中部分基金列为限制性开支 ,用于中国文化教育和研究。为获其资助 ,各教会大学纷纷制定国学研究规划 ,一批国学研究机构由此创立。燕京大学成立国学研究所 ,史学家陈垣任所长。金陵大学得其资助 ,1930 年成立中国文化研究所 ,汇集吕凤子、刘国钧、雷海宗、商承祚等名家 ,是最早被国民政府授权招收研究生的大学之一。同年齐鲁大学成立国学研究所 ,墨学专家栾调甫为首任所长。其他四所教会大学也成立中国文化教学和研究机构。依据哈佛燕京学社设计 ,燕京大学致力于学术研究和培养硕士研究生 ,其他六所教会大学以加强中国文化的本科教学为主。优秀毕业生先送至燕京大学读硕士 ,再选送哈佛大学深造 ,以加强各大学师资培养和国学教学。^[37]当然 ,由中国政府资助相关教会大学培养研究生不受此限制。

这一时期的国学教育 ,在学科属性上大体归为文科门类。其学术组织建制按照近代西学分科 ,研究方法的教学课程遵循西方学术范式。从学科建设与发展来看 ,国学实际上是一门综合学科 ,包容中国语言文字、哲学、历史等传统文化学科的内容 ,在培育人才中发挥特殊作用。在教育层次上 ,国学教育分为中学、专科(或大学预科)、本科及研究生教育四级 ,所讲授国学的程度、内容、体例虽有差异 ,但学术系统一脉相承。

如钱穆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省立苏州中学讲授《国学概论》 ,采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体例 ,分期叙述自孔子至 20 世纪 20 年代中之学术思想演变轨迹 ,而“时贤或主以经、史、子、集编论国学 ,如章氏《国学概论》讲演之例”。^[38] 国学研究院所汇集中国传统和现代学术门类 ,以培养国学人才为宗旨。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 ,“凡研究中国文学、历史、哲学之一种专门知识者属之”,^[39] 研究科目包括文字学、文学、哲学、史学、考古学五大类。清华国学研究院仿传统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 ,“注重个人自修 ,教授专任指导 ,其分组不以学科 ,而以教授个人为主 ,期使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 ,而学员在此短时期内 ,于国学根柢及治学方法 ,均能确有所获。”^[40] 除分组指导、专题研究外 ,各教授每周须做一次普通演讲 ,本院学员均须到场听受。

总之 ,民国时期的国学教育与国学研究 ,在学科性质和研究方法上发生重要变革。“经过近代国学研究 ,中国学术的形式与内容出现重大而明显的变化。形式上 ,以经学为主导的传统学术格局最终解体 ,受此制约的各学科分支按照现代西学分类相继独立 ,并建立了一些新的分支。”^[41] 就国学教育而言 ,传统的经史子集之学已被分解为文学、史学、哲学、文字学、地理学、考古学等学术门类 ,纳入以西学分类为标准的学科体系中 ,每门学科逐渐构建相应的科学理论基础。

三、近代国学教育的成就与问题

民国时期的国学教育 ,受文化观念、学制变革和社会环境的影响 ,经历了兴起、发展和衰亡的曲折历程 ,在高等教育中处于边缘和尴尬地位。从办学过程来看 ,除了无锡国学专门学校之外 ,国学教育研究机构一般存在时间较短 ,有的不到一年即被迫解散。尽管如此 ,在一批倡办者和名师的不懈努力下 ,这一时期国学教育和研究仍取得了重要成就。

首先 ,国学名师从事本科和研究生教学 ,推动了传统学科课程建设。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导师有沈兼士、刘半农、顾颉刚、陈万里、林语堂、马衡、罗振玉、常维钧、单不庵、王国维、陈寅恪、陈垣、伊凤阁、钢和泰等。据《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记载 ,1917—1918 年文科研究所部分教员任教科目包括:哲学门社会哲学史 ,二程学说 ,中国名学 ,老庄哲学 ,儒家玄学 ,易哲学 ,佛教哲学等;国文门音韵 ,形学 ,诂训 ,文字孳乳 ,文 ,文学史 ,诗 ,词 ,曲 ,小说等。研究科目从原有的学科扩展到明清史、雕刻瓷器、汉魏六朝诗、金石学、古声韵学、语音学、宗教史及宗教美术、中国基督教史等。^[42]

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在各自专精的学科范围指导研究生 ,包括经学(书、诗、礼) ,小学(训诂、古文字学、古韵) ,上古史 ,中国文学 ,金石学;诸子 ,中国佛学

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哲学史、东西交通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等;年历学、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研究、摩尼教经典回纥译文之研究、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蒙古满洲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现代方言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中国乐谱乐调;中国人种考。^[43]这些研究开拓了新的学科领域。

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创办国学研究院,一些著名教授兼任该院研究员,讲授课程包括中外文化交通史、中外地理沿革、经学专书研究、中国小说史、人类学、曲选及曲史、目录学、诸子专家研究等。国学院职员还承担院内外演讲任务。尽管受环境制约,厦大国学院半途而止,但它以国文系作为依托,把基础教学与高深研究连接起来,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44]

陈焕章1923年创办的孔教大学,在大学、专门两部之外创办国学部。其专门科预科设8门课程,包括至圣本纪、经学、理学、国史、国文等;本科设24门课程,包括群经大意、诗经学、书经学、礼经学、易经学、春秋学、理学、尔雅说文及音韵学、孔教史、群经学史、选学、诸子学、史学通论等。研究科分为经学、理学、史学、文学四门,学生可任选一门。蔡尚思曾就读研究科。

唐文治主办的无锡国学专门学校,国学教育占主导地位。三年学程,除了党义、军事训练、看护学,还开设15门必修课:散文选、国学概论、文字学、文学史、韵文选、作文训练、中国文化史、目录学、修辞学、版本学、哲学概论、论理学、中国哲学史、西洋文学史、教育学,其中西学课程5门。选修课27门:论语、孟子、文史通义、国术、荀子、音韵学、左传、性理学、昭明文选、毛诗、史记、礼记、史通等,均为中国传统学术。此外,要求作一篇毕业论文。

燕京大学、金陵大学、辅仁大学、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机构,为研究生、本科生开设的中国文化科目,包括历史学、目录学、考古学、哲学、佛教文学、中西交通史、东方学及艺术学、中国文化史、中国民族学、中国宗教史、中国语言文字学、中国文学史、秦汉学术源流、宋辽金元史、中国外交史、中国教育史、中国思想史、中国通史、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国政治制度史等。

其次,培养了一批国学精英人才,为大中学校输送了国学师资。

这一时期国学研究院所办学规模小,导师多为文科各学门(系)教授兼任,招收研究生人数少,却培养出高水平学术人才。据统计,1917年北京大学文科本科生244人,文科研究所国文门研究员42人、通讯研究员11人,哲学门研究员19人,通讯研究员3人。^[45]1922—1927年间,经国文门审查合格的研究生至少有46人。^[46]1927年前,研究所国文门毕业研究生有魏建功、罗庸、张熙、郑天挺、段颐、商承祚、容庚、冯淑兰、董作宾、李正奋、蔡尚思(从孔教大学转考入)等32人。1929恢复办学后两年间,导师有朱希祖、叶瀚、黄节、马裕藻、马衡、沈兼士、刘半农、陈垣、钢和泰、徐炳昶、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等,研究生有张认政、徐景贤、方国瑜、傅振伦、蒋炳南、单士元、谢国桢、高荣魁、商鸿逵、金受申等30多人。^[47]

清华国学研究院办学4年,前两届实际招生58人,后两届录取新生14人。无锡国专毕业生优秀者如吴其昌和蒋天枢等人考入深造。4届共毕业74人,以研究文学(国学)者最多(44人),其余为史学15人、哲学8人、其他7人。^[48]其中包括刘盼遂、程憬、徐中舒、余永梁、杨洪烈、王庸、周传儒、方壮猷、高亨、姚名达、谢国桢、陆侃如、戴家祥、吴金鼎、王力、卫聚贤、姜亮夫、蒋天枢、王静如、罗根泽等人。

其他院校的国学教育也取得重要成就。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含研究院国学部)培养了白寿彝、吴世昌、张长弓、张寿林、牟传楷、班书阁、杨照明等。陈垣任教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培养了大批国学人才。如史念海、周一良、赵光贤、史树青、刘乃和、余逊、姚从吾、郑天庭、陈述、翁独健、蔡尚思、牟润生、齐思和、单士元、邓广铭、谭其骧、方国瑜、韩儒林、容肇祖、来新夏、台静农、启功、郭预衡、叶嘉莹等。^[49]

无锡国学专门学校30年间培养大批国学人才。1923—1935年毕业303人,1936—1948年毕业223人,合计526人;肄业者约2000人左右。^[50]其优秀毕业生王遽常、唐兰、吴其昌、蒋天枢、钱

仲联被称为“唐门五杰”,其他如蒋庭曜、毕寿颐、侯堃、魏建猷、冯其庸、孙易、陈征、郭秋影、汤志钧、陈以鸿、姚奠中等人,也在国学不同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出版一批国学研究论著及刊物,促进了国学传播。

近代国学研究成果颇多,这里就其与国学教育相关者略举一二。清末国学保存会发行《国学教科书》多种,如刘师培编伦理、经学、文学、历史、地理五种教科书,并出版《群经大义相通论》《国学发微》。章太炎1910年在日本出版《国故论衡》,1922年在上海出版《国学概论》,成为国学教育经典之作。1926年钱穆将其讲稿编为《国学概论》出版,影响广泛。

国学教育还推动了一批学术期刊问世。国学保存会1905年创办《国粹学报》,1912年6月改名《古学汇刊》。1922年1月吴宓等人在东南大学创办《学衡》杂志,“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51]至1933年7月共出版79期。1923年北京大学出版《国学季刊》,共出版七卷22期。1927年1月,厦门大学国学学院创办《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共编成4期,实际出版3期。燕京大学创办《燕京学报》。辅仁大学出版《辅仁学志》。1931年5月,金陵大学创办《金陵学报》,并出版《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丛刊》甲、乙两种。

上述办学成就来之不易。在社会政治极度动荡、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近代中国,倡办国学教育,不仅面临不同思想文化的阻力和冲突,在办学理念、经费保障、师资资源、招生就业等方面也存在诸多困难和问题。

就概念而言,学人对于国学含义及国学教育的学科定位认识不一。激进者认为国学是一个含糊的概念,并非真正科学。即使是踊跃投身国学教育和研究的学者如钱穆也存疑:“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52]1945年3月,叶圣陶提出:“国学成不成个学科且不管它,专治国学,把一切现代学科都置之不理,这就是个大毛病。而且,功夫是讲解与记诵,充其量只能造成些活书柜而已。”他认为“现行教育有毛病,必须赶紧改革,这是千真万确的。可是改革成那些书院和专修科之类决不是一条正路。”^[53]可见,时人对于国学及国学教育的方式颇有分歧,这也影响到国学教育的内容选择和评价。

中国近代高校动荡不已,在办学经费、师资、教学环境等方面缺乏保障。胡适感慨“五千年的古国,没有一个三十年的大学!”这些新起的“大学”,“东抄西袭的课程,朝三暮四的学制,七零八落的设备,四成五成的经费,朝秦暮楚的校长,东家宿而西家餐的教员,十日一雨五日一风的学潮——也都还没有造就领袖人才的资格。”^[54]在此教育环境下,国学教育朝不保夕。北京大学、清华学校、厦门大学兴办的国学研究院所,均因经费、师资等问题被迫停办。随着世事迁移,一批集传统学术与新学于一身的国学大师,如王国维(1927年)、梁启超(1929年)、章太炎、鲁迅(1936年)、蔡元培(1940年)相继凋零。加之日本侵华残酷破坏,国学教育遭受沉重打击。

国学教育发展还受学生就业制约。如论者所言,学生选择专业主要受社会、经济需要影响,“晚清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对学生择业择学的深刻影响,并不是靠学校来转移风气的。”^[55]以辅仁大学为例,文史是其最强学科,但国学系学生数量只有西语系的2/3,经济系的3/5。直至全面抗战前,选择国学系的学生并不多。其中就业机会少就是一个重要因素,此外还受日本侵华战争影响。

从学科建制来看,国学教育的兴替受人才培养模式制约。20世纪前半期,中国大学学科建制经历了从科门、科系到院系的演化历程。如果说通才教育模式下的大学院(科)系(门)建制为国学研究院所提供一定的学科发展空间,那么20世纪50年代初实施院系调整后,在专才教育导向的学术建制下,国学研究院所就很难有立足之地了。因此,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和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于1952年最终消失。只有在港澳台院校,国学教育机构尚得以延续。

四、国学如何走进现代大学课堂

经学与国学、经学科与国学是20世纪中国教育史和学术史上有争议的主题,也是新世纪我

国教育面临的重大抉择,需对其教育性质和功能作进一步探析。1928年舒新城指出“一种问题有冲突的事实发生,其内部必有重要的原因,此原因或为思想上的差异,或为‘人’的问题,但若能引起一般人之注意,无论其为进步或退化,均能支配一部分人心,而可以使全部的事实发生变化。”如清末至今之读经问题,无论是肯定或否定,“两方的事实皆有择别的必要,决不可因主观的见解而意为去取。”^[56]经学、国学属于传统学术范畴,具有传统学科的特征,其评价虽受诸多因素影响,但其积极的育人功能已为历史所证明。近代中国之所以学术大师辈出,是与特定历史条件下教育环境的作用密不可分的,其中国学陶冶与西方科学教育影响深远。^[57]

从经学科到国学院的更迭,反映了中西文化的此消彼长。如学者所论,张之洞将儒家伦理纲常作为中学核心有其落后性;但是,“如何摆正中西学间的关系,却是一个近百年来萦绕于中国思想界的问题,全盘西化固然不可,所以仍是一个中西文化结合的问题,是一个如何分辨文化精华与糟粕的问题。”^[58]国学是西学背景下对民族学术文化的总称,“西学在经历现代化之后出现了严重分化,中国文化又在不断地西化中被外来范畴所割裂。作为对中国教育体系过于西化的反弹,‘国学’恰恰代表着中国通识教育本身。”^[59]这表明无论是经学还是国学,已超越政治和历史的功用,而赋有民族文化教育的深邃意蕴,与人才培养、文化传承密切相连。

四十年前开启的改革开放国策,为国学教育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如果说1984年北京大学中国文化书院的创办及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建立,标志着国学教育和国学研究在我国的再次兴起,那么近十多年来,更多高校建立或复办国学研究院所、中心,则促进了国学教育与研究的发展。当代国学教育的兴起,得益于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为其奠定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弘扬民族文化、变革人才培养模式的现实要求。20世纪90年代启动的高校培养模式变革,以及当下的“双一流”建设,为国学教育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

开放的中国需要大力发展国学教育。从高等教育大众化迈向普及化,对外开放程度和水平的不断提高,国际文化交流的扩大,时代发展和人才培养迫切需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发挥其多重功能。国学具有自身的学术价值,推广国学教育是提升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传承和复兴民族文化任重而道远。近百年前,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将民主和科学的理念引入国学研究,胡适预言“我们深信,国学的将来,定能远胜国学的过去。过去的成绩虽然未可厚非,但将来的成绩一定还要更好无数倍。”^[60]学科建设是当今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关键。建设高水平大学和一流学科,需要加强传统学科建设;汲取传统文化精华,国学教育不可或缺。

推动国学教育走进当代大学课堂,需借鉴历史经验,建立相应学科建制,选择适宜教育路径。国学研究院所作为传统学术教学与研究平台,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曾发挥重要作用。当今大学国学教育,主要依托相关院系、国学研究机构的学科建制和学术平台。国学教育具有通识教育 and 专业教育的双重属性,应选择大众化和专业化的教育路径。前者通过院系必修课、选修课教学,传授国学经典,普及优秀传统文化;后者由国学研究院等教学科研机构,开展相关学科的研究生与学位教育,培养国学专门人才。

国学是传统之学、综合之学,汇集语言文学、历史、哲学、政治、法律、地理、自然等传统学科知识,是通识教育的重要内容。通识教育作为一种广泛的、非专业的、非功利的教育,旨在培养全面发展和完整的人。好的通识教育,应该是适合本国需要的教育,注重学习的教育,突破学科藩篱的教育,以经典、核心课程为载体的发展心智的教育,凝聚共同的核心价值观的教育。^[61]大众化国学教育,就是要适应新时代人才培养的需要,通过研读国学经典,提高对民族优秀文化的感悟能力,培养民族文化认同感、核心价值观和健全人格。在这方面,一些高校和国学研究院所发挥了示范作用。如上世纪90年代,清华大学开设《经典十五讲》,讲授《周易》《论语》《老子》《史记》《说文解字》《黄庭经》等经典。广州城市职业学院2007年建立国学研究所,率先开设“国学精粹”课程,以儒学等经典为教材,实践课要求选修琴棋书画等。厦门大学开设中国文学经典、教育经典等通识课程,

推动大学生阅读国学经典。

在专业化国学教育方面,一些大学国学研究院通过不同学科建制,培养国学专才,为传承和普及优秀传统文化服务。如武汉大学2001年开始创办国学试验班,2005年在历史学、文学、哲学学科下招收国学方向研究生,2007年增设国内首个国学博士点和硕士点,培养相关学科的国学人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2005年7月成立国学研究基地,开展国学本科、硕士、博士生教育。复旦大学2008年开始在哲学学院设立国学本科班。南昌大学2009年开办本硕连读、六年制国学实验班。中国人民大学在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立国学二级学科。^[62]清华大学国学院借鉴国外一流大学经验,通过国学研究课题,培养国学人才。

国学是传统学术文化的结晶,其学科建制随着教育变革而演化。百余年来,从经学到国学的嬗变,不仅是传统学科地位的变迁,也是教育目的、学科建制、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的转变,产生广泛的教育和社会影响。当今实施“双一流”建设,需要协调传统学术与现代学科、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关系。推进国学教育,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既要借鉴近代大学的学科建设经验,也需要不断汲取国外一流大学的先进知识,使传统学术与现代文化交融,更好地发挥国学的育人功能。

注释:

- [1]斯日古楞《中国近代国立大学学科建制与发展研究(1895—1937)》(张亚群“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 [2]班固《汉书》卷五十八《公孙弘卜式兒宽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628-2629页。
- [3]俞启定、施克灿《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一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76页。
- [4]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教——中华帝国晚期常州经文学派研究》,赵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051页。
- [5][14]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5、25页。
- [6]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76页。
- [7][9][10]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第四册),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第544-559、560、564-564页。
- [8]葛士澐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一百二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第3226页。
- [11][12][13][16][17][18][19]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527-528、535、565、566、536、544、535、552、556页。
- [15]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574页。
- [20]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第二册),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第147页。
- [21]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五),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5676页。
- [22]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第六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811页。
- [23][31][36][41]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5、11、20页。
- [24][25]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03、309页。
- [26]蔡元培《蔡元培自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65页。
- [27][39][45]朱有瓚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68、96页。
- [28][54][60]耿云志编《胡适著作选》,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423、433、434、541、417页。
- [29][40]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74-376、378页。
- [30]顾颉刚《缘起》,《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第1卷第1期,1927年1月6日。
- [32]胡适《先秦名学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7页。
- [33]闻一多《论振兴国学》,《清华周刊》第77期,1916年5月17日。
- [34]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95页。

- [35][56]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史问题》,吕达、刘立德编《舒新城教育论著选》(下),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644、658659页。
- [37][55]陶飞亚、吴梓明《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90191、169页。
- [38][52]钱穆《国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弁言”。
- [42][47]郭建荣《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变迁》(上),《文史知识》1999年第4期。
- [43][48]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97298、303304页。
- [44]洪峻峰《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与国学系》,《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6期。
- [46]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9页。
- [49]孙邦华《身等国宝 志存辅仁——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48363页。
- [50]吴焯南《无锡国专与现代国学教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94198页。
- [51]《简章》,《学衡》1922年第1期。
- [53]任苏民编著《教育与人生——叶圣陶教育论著选读》,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6566页。
- [57]张亚群《中国近代大学通识教育与创新人才的培养》,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258263页。
- [58]曲士培《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333页。
- [59]刘东《全球化时代通识教育的困境》,《文汇报》2010年7月31日。
- [61]张亚群《什么是好的通识教育》,《光明日报》2016年5月10日。
- [62]曾华《当代大学国学教育研究》,厦门: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171页。

[责任编辑:蔡永明]

From Confucian Classics to Sinology: The Logic of the Reform of Traditional Subjects in Modern Universities

ZHANG Ya-qun

(Research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Scienc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Abstract: Confucian classics and Sinology are different expressions of traditional scholarship and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hanges of traditional disciplines. For more than a century, the change from Confucian classics to Sinology has not only been the change of status of traditional disciplines, but also the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al purposes, discipline establishment, teaching content and teaching methods, resulting in extensive education and social influence. Contemporary reform and opening-up have provided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inology education. Open China needs Sinology education. Today's "Double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development initiative requires the coordination of traditional academic and modern disciplines, as well as Chinese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 To promote Chinese studies in modern university classroom, we should choose a popular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path to better tap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Sinology learning.

Keywords: Confucian classics, Sinology, modern universities, traditional disciplines, logic of change